

仪陇中学的建立与发展简述

马 哲

仪陇县最早的中学——仪陇县立中学校（今仪陇中学），是1925年（民国十四年）县知事陶梦云采纳县第一高等小学校（今金城小学）校长刘星北及县城部分绅士的建议建立起来的。当时共筹建校经费贰拾万钗（铜元），在县城状元街拆去考棚（清代仪陇的试院，今城关中学校址）开始建校。1926年秋竣工，主体建筑为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。学校占地面积12822平方米，有教学用房2663平方米，行政用房460平方米，生活用房1700平方米，其他用房1249平方米，运动场2494平方米，其它用地4256平方米。经呈报四川省政府核准，命名“仪陇县立中学校”。学校建成后，决定开办三年制初中班和二年制师范班，为地方培育人才和教师。当年正式招生开学，招初中一班60人，师范一班50人。确定前清秀才黄蜀俊（成都高师毕业）为首任校长。校长又聘请周克明任教务长，高梓荫任学监（即训育主任），刘礼书为事务长，还聘请了教师和职员。

1933年8月23日（农历七月初三）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攻克仪陇县城。国民党县属机关供职人员逃离，学校停办。1934年农历八月初三，红军第二次进驻县城，腊月二十九日红军撤离仪陇，在国共两军交战中引起火灾，县立中学校舍烧去大半，仅校门边的楼房幸存。其后停办数年，至民国28年（1939年）修补了校舍，方继续开办，改校名为“仪陇县立初级中学校”。

1939年秋，招收初中一班学生50人，春秋两季始业。王德

俊任校长，黄俊明任教务主任。1941年春季增设女生部，开始招收女生，女生在南街关岳庙内（今交通局处）上课。1944年春，为培养小学教育师资，又附设三年制简易师范班。1946年秋，成立仪陇县简易师范学校（仪陇中学附设的师范班并入简师校），校址设关岳庙，又将女生部迁至禹王街王官（今县川剧团处），1948年县参议会决定，增设高中部，学校更名为“仪陇县立中学校”，是年招收高中一班50人。当时学校根据民国政府颁布的《修正中学课程规定》，初中设有公民、国文（后称国语）、外国语、历史、地理、数学、博物（动物、植物、矿物等基本常识）、图画、体育、物理、化学、音乐、手工。1939年取消博物，增设动物、植物、生理卫生，改手工为劳作，恢复习学。师范班设三民主义、公民、教育学、心理学、儿童心理学、学校卫生、教育法令、国文、国语、文法要略、文字学、文学史、教育原理、伦理学、历史、地理、算术、代数、博物、理化、生理卫生、学校管理法、各科教学法、簿记学、图画、手工、音乐、体育、童子军、习学共三十科。高中部设国文、英语、历史、地理、公民、数学、化学、物理、生物、矿物、体育、劳作、图画、音乐、军训。初中每周授课32学时，高中每周授课30学时，二、三年级28学时，每学时50分钟。

仪陇县立中学校从创建到1949年（1933年后停办六年），十七年历程，共招收高中、简师班42班，1980人。毕业学生1140人。

仪陇县立中学校长继黄蜀俊后，有何清若（成都高师）、蒋祐周（成都师大）、杨同寅（成都美专）、王德俊（成都师大）、陈崇熙（成都师大）、陈光琛（成都师大）、严秉珩（成

都师大)、吴石(川大)等相继担任;先后担任教导主任的有:周克明(四川高师)、黄俊明(川大)、何清若、许镇湘(川大);任学监的有高梓荫(顺庆联中);训育主任田维齐(黄埔军校四期)、胡简(上海美术学院)、马煊(川大)、许宗衡(川大)、李扬烈(国立政治大学)、黄子诚(川大美工科)。教学人员先后共有67人,其中有高师学历的37人,占当时教学人员总数的55.2%,中师学历的24人,举人、拔贡、秀才4人,还有留学回国的2人。

民国时期,学校行政工作,推行校长负责制。校长由同级政府考核,报上一级政府委任。校长以下的教务、训育、事务主任、教师、职员都由校长聘请,校长与教职员是雇佣关系,校长有权续聘或解聘教职员工,教职员的职业、生活没有保障,常常随校长的去留或与校长的亲疏而决定去留。因此,那时每当更换校长和遇寒暑假,教职员工都为自己的职业和生活担惊受怕,“六脂战争”由此而起。教职员在学校属雇佣身份,有职无权,工作苦,待遇低,不受社会尊重,呼为“教书匠”。

学校教职工工资推行“等级工资制”。按职务分级,校长、主任、教师、职员、校工五个等级。级差大,职级之间不能逾越。如1940年月工资校长100元、主任90元、教师80元、职员31元、校工10元。

在国民党统治时期,学校施行奴化教育。1928年,校长何清若勾结封建势力和当地军阀,大肆镇压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。规定“学生集会结社应先向学校报告。否则,一经查出,决予斥退”。对学生的民主生活、言行公开进行控制。但反动暴行,吓不倒革命学生。1930年春,学生李继旭(军阀李沛如

的侄子），经办学生伙食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学生伙食款二百多钊（铜元），校长何清若碍于情面，不按伙食公约处理。青年学生席懋昭联络各班学生向校方提出抗议，反被校方指责为“闹事”而激起学生公愤。以席懋昭为首，组织学生砸烂大小厨房厨具，旋即全校罢课、上街游行。校长密谋于政府、公安局，用武力镇压，县长王公度派团练百余人，将学生赶回学校，封锁校门，警戒校内各要口，不准学生走动。游行后的第二天，学校挂牌开除了席懋昭、侯超、任大贤、陈其昌、舒奎、朱崇文和杜克明七人。十多名团丁将这七名同学押往县衙。席懋昭在押解途中逃离，其余六人，被关押在看守所。七天后才被保释出狱。

抗日战争开始后，国民党抱着不抵抗主义，积极推行“先安内，后攘外”政策，在学校推行“四维”、“八德”教育。在学校礼堂墙壁、砖柱上大书“礼、义、廉、耻”（即四维）和“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”（即八德），还把“礼、义、廉、耻”作为校训。

为了揭穿国民党“安内攘外”的反动实质，学校进步师生开展了爱国抗日宣传活动。1931年“九·一八事变后”，师生即发出快邮代电，呼吁各界齐一步代，共同抗日。九月二十三日，学校下半旗一天，停止宴会、娱乐，以示悲愤。1942年，全校师生从口头宣传到化装宣传，组成抗日宣传队，走出校门到县城和县城附近的日兴、土门等场镇向群众表演杂耍和演唱以抗日为主要内容的金钱板、莲花落、花鼓等节目。后又与县城群贤俱乐部联合演出《岳母刺字》、《祭岳》、《柴市节》等川剧节目。师生还演出过《雪地忠魂》、《父与子》、《反正》、《封锁线上》、《扬子江的暴风雨》、《抗日英雄》、

又自编自演《戚继光抗倭记》话剧节目。在这些演出中教师胡玉麟、王德俊、马煊、黄俊明等担任过主要角色。师生演出和卖水共得银币六十余元，全部献给了抗日战士。

1950年2月，仪陇县人民政府组织校务委员会，任命张幼房、吴石隐为正、副主任，将县私立南图初级中学校和简易师范学校合并成立“仪陇县中学校”。1952年秋，上级指示，将仪陇县中学校原招高中部的学生分年级并入蓬安、南部、营山中学学习。

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，在校学生逐年增多，旧县中校原有校舍不能适应需要，经川北行署批准，1952年由县人民政府拨款，在县城东门外新建仪陇中学校。同时学校更名为“四川省仪陇中学校”，任命关景尧为校长。经两年多时间，建成砖木结构一楼一底教学、办公用房、宿舍六幢，其中教学用房占地3074平方米，办公用房722平方米，生活用房4386平方米，其他用房1877平方米，运动场地9352平方米，种植园地3002平方米，其它用地50191平方米，合计占地72604平方米，比解放前增大五倍多。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是张幼房（留学日本），继任的有许明扬、关景尧、侯让之、吴光万、朱朝正、严育仪、姜福林。

1954年秋，部分班级迁入新校。1956年春，初、高中各年级进入新校舍上课，原有校舍，借给县委党校暂时使用。同年秋，将已停招四年的高中部，重新招生开办起来，学校定名为“四川省仪陇中学”，按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《试行草案》初高中课程设置排课，设有政治、语文、外语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、生理卫生、体育、音乐、美术等课目，初一每周授课30节，初中二、三年级每周授课各31

节；高一每周授课 29 节，高中二、三年级每周授课各 26 节，每节 45 分钟。劳动技术课初中每周安排 4 节，高中每周 6 节。

1966 年 5 月，中共中央发出“文化大革命通知”（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6 条），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；6 月，中央文革通知“停课闹革命”；7 月，工作组进驻学校，发动全校教职员工开展“四大”（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）；8 月，教职员工集中到南充地区参加“文化大革命学习。”回校后，学校按上级部署，在教职员工中分类排队，将部分教师、职工列为重点批判、斗争对象。不久又将斗争矛头指向学校“当权派”和所谓的黑五类（指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），校长朱朝政、侯让之，教师高天升、艾华、熊秉尧、樊定晋、唐天鑫、韩明皑、廖由信、黎英、陈鸣志、李明恕等 19 人被批斗，有的被关进“牛棚”。李明恕不堪逼供，跳岩自杀。学校领导被夺权，组织机构瘫痪。12 月，教师学生纷纷离校外出串联。

1967 年 9 月，中央文革指示：“复课闹革命”。外出的师生陆续回到学校，但实际没有复课，而是大搞派性斗争。学校形成“临联”和“反逆流”两大群众组织，各自标榜是革命派，互相攻击，寸步不让，大辩论、大字报，唇枪舌战，日夜不休。课堂辩论，慷慨激昂；课外串联，文攻武卫。学校门窗桌椅遭到严重破坏，图书损失四千余册。

1969 年，学校两派实现大联合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，开始“抓革命促生产”。随即工宣队进驻学校，师生开展“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，学校贯彻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的方针，一边上课，一边劳动。1970 年和 1971 年，教职工参加“一打三反”（打击现行反革命、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）和

一批双清（批“极左”思潮，清查“五一六”、“三老会”分子）。以后学校又开展学黄帅、张铁生等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，提倡师生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，早请示，晚汇报，三忠于，四无限，语录不离口，红宝书不离手，各科教师，课前用毛主席语录作指导，课后用毛主席语录作总结。师生员工人人斗私，个个批修，就连吃饭、睡觉前都得高声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，要求从“灵魂深处闹革命”。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，农村大忙季节，或准备生产现场，或有某级领导来检查，一个通知，一个电话，学校必须马上将师生带到生产第一线。栽秧、打谷、挖塘修堰都得参加，学校师生除教本、教案、课本、作业本外，锄头、扁担、背篋、镰刀，必不可少，而课程一减再减，唯有的几门课也是课本一期比一期簿，高中降到了初中，初中降到了小学，尤其通过“批判五分加绵羊”，学校把教学工作降到了次要地位，学生升学凭手掌上的茧有多厚，由贫下中农推荐。致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。十年动乱中，仪陇中学同全国各地学校一样，惨遭浩劫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通过拨乱反正，肃清“左”的影响，受迫害的教职工得到平反昭雪。党又提出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，尊师重教，教育成了基础，昔日的“臭老九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，国家的主人，四化建设的中坚力量，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，社会的尊崇。仪陇中学教师的精神枷锁解除了，教学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，教学秩序日趋正常，教学质量逐年提高，教学工作成绩显著，多次受到省、地、县的表彰。教师马煌、朱诗俊、唐天鑫、任宽等先后被选为县人大代表；廖由信、任宽、蒋桂勋、朱朝政、蒋祐周、韩准甫等先后被推荐为政协委员。他们积极参与当地重大事务的决策和实施方针政策

的协商监督。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。李光亮、王广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，并受到国家教委表彰；韩准甫、李荣光、戴荣光、胡登良、李征熙、魏光宗等被评为省劳模；廖由信、韩准甫、蒋立宪、蒋桂勋、李吉华等被评为仪陇县先进个人；李光亮、王广祥、张刚、伍洪志（女）、陈胜利等被评为仪陇县优秀教师；廖由信、唐天鑫、韦季达、高隆兴、梁龙林、蒋立宪、王治英、陈善荣、胡登良、韩准甫、吴敌、李吉华、严启亮、胡昭生等被评为仪陇县先进教师。

现在的仪陇中学，有初高中30个班，在校学生2171人，教职员工165人（其中教学人员93人）。1982年被地教委确定为南充地区重点中学。目前，学校占地面积由解放初的12882平方米，扩大到72604平方米。教学大楼、理化实验大楼、图书大楼、大礼堂、教研室、教师宿舍、食堂、医务室、印刷厂等建筑鳞次栉比；实验设备，各科教学用具齐全；图书逐年增多；师资力量雄厚……。学校正在向教育现代化迈进。

仪陇中学建校迄今（1926年—1993年），共招收学生18572人，毕业学生15045人（其中，新中国成立后毕业13594人）。为大专、中专、高中输送合格新生2984人，其中考取大专院校的有1761人，中专235人，中师164人，高中824人。这批学生经过深造或自学成才达到教授、讲师、主治医师、工程师、党政县级以上干部的有290余人，其中教授7人、副教授6人、讲师5人、助教1人、高级工程师2人、总工程师5人、工程师54人、助理工程师5人、博士1人、省、地、县党委书记4人、其他类技术人员不胜枚举。其中革命烈士席懋昭，四川省省长肖秧，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胡自逢，留美博士许章保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戴昌世，中

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研究生刘知惠（女），清华大学系主任杨品，中国科大物理系主任、总工程师何多惠，上海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于定孚，重庆大坪设计院总工程师张鸿瑜，云南某国防工厂总工程师唐少华（女），戏剧学院教授杨大志，成都电力工程学院教授李尚准，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陈跃福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1996年，是仪陇中学建校70周年。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将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，以更优异的教学成绩，迎接建校70周年的到来，届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校友将回母校，畅叙仪陇中学的光荣历史和为国家做出的特殊贡献。

仪陇近代书法探源

陈 国 卓

仪陇近代书法，从现在的一些资料和记载来看，是承清之余绪，纵势为尚，变古为新，南北兼收，碑帖并重。其中行、草书继宋明之后，在经历了帖学和碑学的曲折道路后，得到迅速发展；钟鼎、石鼓文为专家学者所注目；正书推重韵度，各呈异趣；隶书和小篆沿清末之余波再放光彩。概括起来说，推动仪陇近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：

一、摩崖、墓碑、寺庙匾额对仪陇书法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

我县的摩崖，首推新政的“鲜于氏离堆记”。此崖刻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于上元元年秋八月谪贬蓬州（今仪陇大寅乡）长史，路过新政时撰书，全文七百余言，字径九厘米，今

尚残存三十九字，为颜氏五十二岁所书，评著推为颜书现存石刻第一。

由于人们崇尚书法，一些庙宇匾额，大户墓碑，都请名家书写。如清末的仪陇知县陆成本就是一位很有艺术修养的书法家。陆字宝田，号画村，浙江肖山人。他留在仪陇的墨迹很多，如金城公园观音阁前的牌坊“灵阴方州”；永乐关帝庙内戏台上的匾额“响遏行云”；马鞍镇顺天庵内的“孝善宏开”；大寅镇关帝庙内的“威灵有赫”，一派颜字书风，疏朗古拙如纠纠武夫，为后人所珍爱。

伍生辉，字介康，号凤初，又号凤轩，陕西泾阳人，光绪十五年任仪陇知县，他的书法学黄山谷而又有自己的风格，曾在仪陇金城山观音阁留有石刻《翁子四时读书乐》条屏四幅，唐人许浑诗句集联：“溪云初起日沉阁，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写得长戟大刀凝练而有隼气。

许绍岳，名学道，字湘南，仪陇日兴人。他的字端庄流丽，楷书在欧赵之间，显得飘逸洒脱，洗练流畅。日兴场李世周家之木匾“螽斯衍庆”和日兴龙母官正殿对联“后德溥三才，扶阴教，理阳纲，阐明天秩天序；母仪周四海，息洪波，平巨浪，驯养龙子龙孙”即其手书。

黎重，名良斌，仪陇响水黎家山人，前清廪生，少时家贫，依外祖母杨氏资助入学，在名师吴瑞指点下苦练书法，青年时代即名气远扬。他专工颜字。据说仪陇县文庙竣工，知县王燮慕黎善书，专请黎入城为文庙题字，并想借机窥其笔法，命人备好纸笔，王亲候书写，黎只顾抽烟，王见久不动笔，便去上厕所，此时，黎挥动当笔的麻团疾书“万仞宫墙”四个近两米见方的颜体大字，结构缜密，无隙可击，王未能目睹，不

快而去。

这些名家所留手迹，对近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二、名家讲学授艺是推动仪陇书法发展的重要力量

在仪陇讲学授艺的首推三王、三李和陈、刘诸家。

三王即：王履庆、王善堂、王缙。

王履庆，仪陇县柳坪镇人，前清禀生，入国子监后，返乡执教。少年勤苦好学，研习书法，寒暑不辍，后书有成，在仪陇东南一带享有盛名，推为仪巴边境书法之佼佼者，著有五体（真、行、草、隶、篆）字帖行世。

其子王善堂，号锡祺，自幼随父习书，勤奋好学，颇有所得。在顺庆院试，主考在卷上批“文章清淡，字盖八属（顺庆辖八县）”，一时名震果州。在家乡授书艺，著有《楷书二十四品》行世，墨迹有临王羲之《乐毅论》长卷一幅，现存大寅陈国通手（文管所有影印件）。在柳坪镇九村书有“铭心桥”三个一米见方的大字。往来文人无不叹为观止。惜为水淹，不能复见。

王缙，王善堂之子，名秀航，曾毕业于顺庆联中，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参谋，以后从事教育工作，一贯坚持书法练习，尝收名人字画，其字宛有父风，誉满广元、中江、巴中、仪陇一带。

三李即李敷荣、李新九、李德门祖孙三人。

李敷荣，名朝选，号锦堂，仪陇金城镇人，前清贡生，邑中耆宿，书法金石，冠冕群伦。李善篆隶，尤工玉箸，结体隽秀，浑厚雄健，曾参与编修仪陇县志，晚年授艺育人，后人多敬之。

其孙李新九，名良炯，号鼎勋，前清岁贡，未入仕途，随祖父学书，汉隶、秦篆、魏碑、唐楷无不涉猎，尤以篆隶著名，凌云山之“二士凌云”四字即其手书。

李德门，李新九之子，名聚垣，号秉谦，又号大痴，幼时随父学书，从颜书入手，潜心研习，深得其父篆隶三昧，性嗜酒，晚年在县境内各地设馆教书法。曾在石佛（现旭日乡）肖家梁传习书法，桃李通城乡。后人赞“祖孙三代书家弟，一门寒土翰墨香”。

陈书，字少林，号翰卿，仪陇响滩人，八岁随父陈怀文学书法，八年勤苦，寒暑不辍，后又拜名家赵熙为师，苦习三载，颇得颜书精髓。平生以书养家，常在重庆、合川、遂宁、蓬溪、南充、梁平、广安等地从事书法教学，并总结了一套教学理论。仪陇川剧团舞台幕布上的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，即其手书，现已毁损。

刘长庚，字西义，仪陇大寅镇人，幼好习字，拜王善堂为师，常步行数十里去师家请教，二十年如一日，三十岁后在成都拜眉州书家余少泉为师，越二载，书艺猛进，返乡献技，誉满邑南诸场。他学习刻苦，重金收藏名家真迹善本，他擅长行、草书，有千字文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深得二王墨妙（已遗失），现存《朱子治家格言》一册，文管所有影印件。晚年居乡，以“永”字八法为基础传授学生。

由于这些前辈热爱艺术，热心教育后人，对仪陇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三、学校对书法教育的加强，是培养书法人才的必由之路

民国时期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在新的教育体制中，书法与绘画同样成为专门的艺术学科，书法教育开始改变单一的师徒

授受为现代的学校教育，这一转变，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。当时担任仪陇中学书法教学的鄔丹阳、何清若、周芳百、高梓荫等老师即堪称当时的佼佼者。

鄔丹阳，名泽湖，仪陇柳垭人，四川大学文学系毕业，初习颜字后习北碑，对《张玄墓志》用工最深，社会人士求书者从不推卸，深受众赞。

何清若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，他书学颜字，兼善北碑，结字用字宛如何绍基，古朴刚健，入纸三分。社会人士，多请写寿幛挽联，均慨然应承。

周芳百，字克昌，仪陇日兴人，四川高等师范毕业。他的书法先宗颜柳，后学山谷，特以真行见长，常于课余作书，寒暑不断。

高梓荫，字克勤，仪陇金城镇人，顺庆联中毕业。幼从李新九学书，善行楷，间习篆隶。每逢春节，求书者络绎不绝。

仪陇近代书法，是一个继清末之后，继续发展的时期，历时虽然短暂，却涌现出一批成就较大的名家。他们为今天书法艺术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仪城迎春桥、迎春门、迎春习俗及其它

李 玟 玟

今天的仪陇金城小学，是清代仪邑最高学府金粟书院。昔日，在书院大门外有一条直通巴州的石板便道，习称驿道。从书院门口启步，沿着驿道向东走去，行至一百米处，猛见转弯道上横卧着一座巧小石桥，桥面系用两块长条形石板合并铺垫

而成。小桥长不足三米，宽仅一米五，下有一条小溪流，每逢夏日雨水大作，始闻流水从桥下哗哗淌过。别看这么一座貌不惊人的小石桥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，它在古老的仪陇城中却颇负盛名。因为，过去每岁正月立春之日，身为一县之长的知县，皆要率领全城官员百姓，跨越此桥去迎春天的来临，故取名为“迎春桥”。

离开迎春桥继续向东前行，踏驿道，登石级，来到东城门，门洞上建有城楼，楼高六米许，全系穿斗纯木结构，四角高翘，力拱歇山式屋顶，城堞为巨石砌成，居高临下，陡悬险绝，令人寒栗。城门两侧是高五米、宽三米的石砌墙垣向左右延伸。左侧城墙与陡石梯、观音阁相接，直上金城山顶，通向柳家岩巅的北寨门；右侧城墙向东南逶迤而下，经过中元祠后的老南门，然后指向县署正南方与新南门相銜。封建时代，东为四方之首，东乃太阳升起的方位，象征着光明、吉祥、新生和如意，所以，旧时迎接春天到来又从东门伊始，东门也就被称为“迎春门”了。

说到“迎春”，不禁人联想起古时仪陇城迎春会的盛况与习俗。据考，在清代和民国中期，每逢夏历一年开始的第一个节令——立春日。这一天仪陇城总要举行隆重非凡的迎春会。清晨，人们用罢早膳，男女老幼便穿上节日的盛装，自觉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尾随知县和三班八房，各署、局、处的官员之后，从大堂口出发，经过衙神街、状元街、竹溪桥街向迎春桥鱼贯前往。顿时鼓乐喧天，礼炮齐鸣，爆竹声震长空。人流浩瀚若海。当迎春队伍来到迎春门时，事前在那里准备停妥的“春牛”和“春官”，便出现于知县、县吏和赴会城中居民百姓的面前，经过一番简略的迎祭礼节后，“春官”赶着“春

牛”，或壮士抬着彩纸扎成的“春牛”，作为前导，官员百姓紧随其后，接进城去在大街上游行，此一礼俗，民间叫做“游春”。那时，仪陇城备办的“春牛”有两种，一是用五彩斑斓的有色纸糊在竹篾扎成的“耕牛”身上，而成为迎春会上游行的“春牛”；另一种则是用一头膘肥体壮的真牛，在头顶戴上一朵用大红绸扎成的泡花，泡花托柄下两条长长的绶带，在耕牛左右两只角上缠绕三转后向下飘拂，然后再以一聪明活泼的男孩，穿红着绿，扮成牧童，坐骑在“春牛”背上，等待进城游行。不过，这两种“春牛”每年只取其一，不得二者同时并用。

人们赶着或抬上“春牛”游街完毕，就向县衙门的正堂走去。当“春牛”来到大堂前庭，知县便挥动着彩纸缠好的竹鞭，向牛的脊背抽打数下，此刻“春官”就沿例说上一些褒奖奉承话或吉祥祝福语，以博得知县的欢欣，领到应得的赏银，至此，游行人群和“春牛”出衙离去，迎春会方告结束。所以，后来人们对于善会触景生情、灵机应变，言之成章，说之有理的人，比喻成“春官”一般的喜好游说的说客，其典故即出自此。

过去，县城官绅市民于每岁立春日举行迎春会，把为农业生产出力最多，劳累最重，对人们贡献最大的耕牛，作为“春”的化身，加以百倍珍爱，迎春会这天，人们从身穿节日礼服，去至东门迎接“春牛”，到欢歌笑语遍游街衢，入大堂鞭抽“春牛”的全过程，真是盛况空前，无能比拟。这种活动，藉喻着春回大地，春满人间，寒冬已逝，阳春降临，提示农民抓紧时机，备齐肥料、种子、农具，安排好新的一年生产计划，不误农时地进行春耕生产，争取年下有一个好收成。就

某种意义上讲，昔日的迎春会对重视大抓农业，促进农业发展，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。

立春，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已作为春季的开始节令。立春是从天文上来研究划分的，而在自然界和人们的心目中，春是温暖，鸟语花香；春是生长、耕耘播种。在殷商的甲骨文中，人们就用太阳和草的形象组成了春字。在我国南方，立春之后，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风恬日暖荡春光”。南宋诗人张栻（四川绵竹人）在《立春偶成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律回岁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间草木知”，形象地描绘出立春时节的自然景色。